

# 阿梅丽·诺冬《诚惶诚恐》中阿梅丽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建构

## Améli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mélie Nothomb's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宋 歌 (Song Ge)

**内容摘要：**《诚惶诚恐》是比利时女作家阿梅丽·诺冬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该作品以比利时女孩阿梅丽与日本同事之间的文化冲突为中心，讲述了阿梅丽在日本工作期间遭受挫折的故事。比利时女孩阿梅丽从小饱受日本文化熏陶，因此她渴望日本人的身份。于是，成年后的她选择重返日本。然而她所遇见的日本同事冷漠又虚伪，他们对阿梅丽的排斥态度表明他们并不认可阿梅丽的日本人身份。阿梅丽因此陷入伦理困境，而不得不逃离日本回到比利时，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比利时人身份。阿梅丽·诺冬在《诚惶诚恐》中着重强调伦理在价值观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表明了自身及阿梅丽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否定态度。

**关键词：**《诚惶诚恐》；伦理身份；伦理选择；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宋歌，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国文论、当代法国文学研究。

**Title:** Améli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mélie Nothomb's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Abstract:**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novels of the Belgian female writer Amélie Nothomb. The work centers on the cul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Belgian girl Amélie and her Japanese colleagues, and tells the story of Amélie's setbacks while working in Japan. Amélie, a Belgian girl, has been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ulture since she was a child, so she yearns for a Japanese identity. She chooses to return to Japan at adult age. However, some of the Japanese colleagues she met were indifferent and hypocritical, the rejection of Amélie shows that they do not recognize Amélie's Japanese identity. As a result, Amélie fell into an ethical predicament and had to flee Japan and return to Belgium, re-examining her Belgian identity. Amélie Nothomb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expressing her own and Amélie'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ethnocentrism.

**Keywords:**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uthor:** Song Ge is Lecturer at the French Department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Email: leosongge@163.com).

阿梅丽·诺冬（Amélie Nothomb）是比利时女作家，因其自传体小说《诚惶诚恐》（*Stupeur et tremblements*, 1999）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别样呈现，于1999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诚惶诚恐》描写了选择做日本人的比利时女孩阿梅丽来到日本工作，在屡次遭受到日本同事排斥后，终于认清现实，选择做比利时人，并实现了比利时人身份建构的故事。有研究者认为阿梅丽放弃日本生活返回比利时重新选择做比利时人，与作者本人人生经历吻合，阿梅丽身份转变的过程似乎也是作者探究自身身份之谜的尝试，于是提出该小说区别于阿梅丽·诺冬其他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虚构与真实的结合。<sup>1</sup>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阿梅丽的转变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的过程，体现了伦理环境（ethical environment）对于身份建构的影响，强调文化差异的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在做出第一次生物学选择即获得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还经历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Nie 384）。伴随阿梅丽对日本人身份与比利时人身份的理解加深，她将选择比利时人身份的意识转换为实践，实现了对日本人身份的解构与对比利时人身份的建构，成长为具有自觉理性和伦理意识的人，完成了自己的伦理选择。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阿梅丽重返日本过程中经历的伦理选择和导致的结果进行分析，揭示阿梅丽·诺冬的伦理思想，以及小说表达的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考。

### 一、阿梅丽的日本人身份建构

《诚惶诚恐》有着一一条清晰的伦理线（ethical line），这条伦理线串联了几个重要伦理结（ethical knots），其中最要的是阿梅丽在建构日本人身份的过程中与不同日本同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提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问题”（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在面对日本同事排斥时，阿梅丽最初尝试通过妥协来换取对方的认同，但一次次的打击表明妥协无法使她成为真正的日本人。日本同事所表露的排斥态度在追求融入的阿梅丽的意识里投下

<sup>1</sup> See L. Amanieux, *Le récit siamois: Identité et personnage dans l'œuvre d'Amélie Nothomb*,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了阴影，选择做日本人的阿梅丽逐渐陷入伦理困境并开始思考是否要再次做出伦理选择。

阿梅丽出生于日本，在那里度过童年并接受日本教育，她对日本怀有真挚的感情。这来源特殊的伦理环境：阿梅丽的父亲曾任比利时驻日本外交官，父亲本人被日本文化深深吸引，因此阿梅丽在成长过程重饱受日本文化熏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父亲营造的伦理环境直接影响了阿梅丽对日本的情感。对于日本人的身份，阿梅丽在孩提时期就有了初步的认识，她“一直这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直到我五岁那年离开日本”（147-148）<sup>1</sup>。因此，当她成年后对身份问题有了更深刻认知时，她毫不犹豫选择做日本人。然而，家庭文化塑造出的伦理环境不仅影响了阿梅丽的伦理选择，也给她重返日本带来了困惑。

特殊的伦理环境使阿梅丽未认识到自己的比利时人身份，即她的隐性伦理身份。“所谓隐性伦理身份，就是指作品情节赋予了人物某种伦理关系而人物对这种伦理身份没有认知”（刘家思 刘璨 513）。阿梅丽总按照自己显性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日本人身份展开行动。所谓的显性伦理身份，就是小说情节中明显呈现的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sup>2</sup>小说中人物对其伦理身份有自觉的认知。例如，阿梅丽的行为往往朝着自己日本人身份的相反方向行进，这也最终导致了她在公司不得不承受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精神打击。

阿梅丽刚入职就立即对公司森严的等级制度产生了直观印象：“羽田先生是尾持先生的上司，尾持先生是西户先生的上司，西户先生是莫利小姐（胡布纪）的上司，莫利小姐是我的上司。我呢，不是任何人的上司”（1）。位于等级金字塔最底层的地位，似乎预示着阿梅丽在公司的发展注定非常艰难。对于阿梅丽来说，她选择做日本人意味着当自己遭受日本同事的压迫与排斥时不能进行反抗，而只能选择妥协来得到日本同事的认可，因为这才是她所理解的日本企业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妥协并没有被日本同事接受。

阿梅丽·诺冬运用自传体小说形式表现阿梅丽尝试建构日本人身份的过程，该过程以阿梅丽与日本同事冲突的情节展现。第一次冲突发生在阿梅丽与日本同事西户先生之间。西户先生是日本文化的阐释者，他与阿梅丽之间的“文化冲突”对于阿梅丽意识到自己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有着重要影响。西户先生追求日本人至上，不相信外国人阿梅丽的能力，他的想法也折射出部分日本同事的种族中心主义心理。例如，阿梅丽应聘的是正常工作岗位，却被命令打扫公

1 本文有关《诚惶诚恐》的引文均来自 阿梅丽·诺冬：《诚惶诚恐》，廖观友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参见 刘家思、刘璨：“论曹禺戏剧创作中的伦理问题”，《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1）：513。

司男厕所，还被冠以“厕所女郎”（173）称呼，而部分男同事也服从上级指示专门前往该厕所，他们认为“外国人受到侮辱与我没有关系”（108）。

在公司里，外国人被认为无法胜任工作。在西户先生眼里，阿梅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白人，她的智商、情商、语言能力不可能与日本人相媲美。在一次接待其他公司代表团来访时，阿梅丽熟练地使用日语沟通，而西户先生则认为阿梅丽展现流利的日语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此，他禁止阿梅丽使用日语，并提出她应该忘记日语这一荒唐要求。对此，阿梅丽也提出了质疑：“可正因为我懂日语，伊美本公司才录用我的呀！”（12）但西户先生以上司身份发出不容置疑的命令：“这我不管！我命令你不懂日语”，“必须服从，这正是西方人必须明白的”（12）。最终，阿梅丽作出了与其他普通日本同事一样的选择——无条件服从上司的命令，哪怕是不合理的。听到西户先生充满种族中心主义的命令，以日本人自居的阿梅丽选择用日本社会的伦理规范来约束自己，其目的是使自己尽量表现得像一名日本人。

第二次文化冲突发生在阿梅丽与公司副总裁尾持先生之间。尾持先生也是一个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十分推崇日本社会所遵守的等级制度文化与面子文化，因此认为作为工作能力不足的外国人，阿梅丽应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而他的粗鲁行为使阿梅丽坚持做日本人的决心产生了动摇。当阿梅丽来到尾持先生的办公室商谈离职事宜时，尾持先生强迫阿梅丽吞下令人作呕的绿色巧克力，这再次导致冲突爆发。当阿梅丽拒绝吃下巧克力时，尾持先生愤怒地喊道：“放肆！你不能向我提问！你应该服从我的命令”（131）。尾持先生的强硬态度逼迫阿梅丽做出选择：“折下了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绿色巧克力，把它送到嘴里”（132）。面对尾持先生的无理要求，阿梅丽作出了与第一次冲突一样的选择——妥协，她以为“侮辱自己可以挽回他们的面子”（132），并得到公司的挽留。但是，尾持先生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愉快地接受了”（133）。

两次文化冲突实际上是阿梅丽建构日本人身份的两次尝试，究其因是因为她始终无法摆脱儿时伦理环境的影响，她“完全地、充满亲切感地甚至悲剧式地迷恋日本”（Zumkir 95）。对于阿梅丽而言，重返日本最大的动力便是美好的回忆，这显然是一个感性的决定。“个体的选择容易被情感主导，一旦缺乏理性就会形成悲剧”（刘家思 刘璨 516）。日本同事的种族中心主义思想使她感到挫败，“什么是我真正的身份？”这个问题提醒阿梅丽应尽快确认自己的身份。固有的认知和现实中的遭遇暗示着阿梅丽最初的伦理选择是错误的，她必须作出新的伦理选择。阿梅丽的显性伦理身份日本人身份与隐性伦理身份比利时人身份无法共存，这导致她陷入了伦理困境。

## 二、阿梅丽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

在于文学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8）。在《诚惶诚恐》中，阿梅丽的伦理两难（ethical dilemma）表现为继续尝试做日本人还是做比利时人。她在既有的生活模式与世俗思维定势中苦苦挣扎：接受意味着继续面对无尽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事件，继续向日本同事的否定与排斥妥协；拒绝则意味着与现在生存状况的决裂，放弃美好的回忆。

与日本同事间的文化冲突使阿梅丽意识到他们并不把自己当做日本人看待，这也意味着她的日本人身份无法受到认可，而在离开日本前与日本同事的道别则印证了她的猜测。因为长期打扫厕所，阿梅丽在日本同事眼中竟然不被看做是人，更遑论被看做日本人，这使得她做日本人的决心彻底动摇，她坚定地意识到应该做出新的伦理选择了。阿梅丽建构日本人身份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低估了被日本同事所认同的困难程度。

两次文化冲突事件很好地展现了阿梅丽所遭遇的困境。第一件事仍然与等级制度问题有关，不过它还同时涉及到日本文化中的另一问题——男女地位不平等。一天，阿梅丽亲眼目睹了女上司莫利胡布纪如何被副总裁尾持先生当众训斥，而且“并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臭骂她，而是当着财务部四十多个人的面当场骂她”（85）。一方面，男性可以如此公开地侮辱女性使她感到震惊，“对于随便哪个人来说，尤其是对日本人来说，对傲慢而高贵的莫利小姐来说，没有比这种公开撤职更侮辱人的了”（85）；另一方面，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使阿梅丽在面对该问题时倍感无力，“同事们个个深感痛苦。他们尽可能地板起脸，把自己的耻辱藏在案卷或电脑的荧屏后面”（85）。对阿梅丽来说，以往对日本文化的回忆和幻想不复存在了。阿梅丽·诺冬在其涉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自传体小说中一贯强调伦理观念的实践性本质，正如阿梅丽一直以来对待日本文化的态度：“所有想融入日本的外国人，都把尊重帝国的习俗当作是名誉攸关的事”（97）。在决定做日本人后，阿梅丽始终遵循着日本的伦理规范。但是在对外国人要求严苛的日本企业，日本同事对她的排斥态度表明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并未得到认可，陷入困境的阿梅丽逐渐意识到在日本同事的眼中她可能自始至终是比利时人阿梅丽。

第二件文化冲突事件的发生促使阿梅丽直面自己日本人身份建构失败。在公开侮辱事件发生后，阿梅丽试图安慰莫利胡布纪。此时，摆在阿梅丽面前的是双重伦理规则，其一是西方文化所给与的对于个人处境的关怀意识；其二则是日本的“面子文化”，即一个人在遭受侮辱后并不需要他人的安慰，而是希望大家回避事情的发生，采取避而不谈的方式来保证受辱者的面子。阿梅丽做出了安慰莫利胡布纪的选择，直接用话语向女上司表明了对她遭遇的同情。阿梅丽甚至伸出自己的胳膊试图安慰莫利胡布纪，然而莫利胡布纪的反应令阿梅丽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就在这时，我看见她两眼冒着愤怒的光芒，惊讶地向我转过脸来。她愤怒得声音都变了，朝我吼道：‘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敢

这样？’”（91）

阿梅丽安慰莫利胡布纪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她事实上对日本文化缺乏真正了解。在讲究含蓄表达自己悲伤情感的东方国度，阿梅丽的直接安慰行为使自己的上司感到羞耻与愤怒。在莫利胡布纪眼中，阿梅丽并不是真正想安慰自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这一举动也导致莫利胡布纪对阿梅丽做出了更多排斥行为，以达到使阿梅丽离开的目的。在建构日本人身份的过程中，尽管阿梅丽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得日本同事的接纳，但却不得不面对遭受排斥的现实。随着友善行为的减少、排斥行为的增多，阿梅丽陷入孤立无援状态，她企图获得日本同事身份认同的努力宣告失败，并面临新的伦理选择，即：或继续尝试以日本人的身份工作下去，或离开日本返回比利时。

阿梅丽与日本同事相处的失败意味着她的日本人伦理身份失去主导地位，她被这个自己深爱的“祖国”彻底拒绝。她试图融入日本同事之间，却深感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因此，阿梅丽只有重新做出伦理选择，才能建构新身份。

### 三、阿梅丽的比利时人身份建构

对阿梅丽而言，一方面她不得不做出新的伦理选择，她希望在日本人不认可她的身份时，比利时同胞们能够承认她的比利时人身份；另一方面离开日本的选择对她来说也意味着对日本人身份的告别，即她不再需要其他日本人对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认可。“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而这些都是通过教诲实现的（……）人类的文明史表明，人类主要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进行教诲或从中得到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10）。促使阿梅丽下定决心进行伦理选择的关键点是莫利胡布纪命令她专职打扫公司厕所，正是这一有辱人格的工作使阿梅丽彻底醒悟。对于阿梅丽来说，一些枯燥无聊的本职工作与言行上的嘲讽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打扫厕所这一工作安排不仅是在丑化她在公司的个人形象，而且更是对她日本人身份的一种完全否定。

针对阿梅丽被迫成为厕所女郎后的心态变化，我们需要关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事物——窗户。窗户在阿梅丽·诺冬的作品中往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从整体来看，伊美本公司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故事情节全部在大楼内部展开，窗户是大楼里唯一可以感知外界的途径。阿梅丽在打扫厕所时发现了窗户的价值，即现实与想象的分界线，“窗是可怕的灯光与可爱的黑暗、厕所与永恒、卫生保健与难以洗净、抽水马桶的水箱与天空之间的界限”（137）。在凝视窗外的虚无时，阿梅丽曾尝试投身其中，“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在那里，额头贴在玻璃上，想象着自己被投入了虚空当中”（109）。这意味着阿梅丽对现实丧失了信心，屡次打击使阿梅丽尝试自杀，她幻想自

己跨过窗户纵深跳向窗外的虚无，以此摆脱现实中的压力。

“日本皇家的旧仪式规定，对天皇说话应该‘诚惶诚恐’”（126），种族中心主义已经让伊美本公司变成了等级森严的“帝国”。阿梅丽认识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以莫利胡布纪为代表的日本同事都不会认可她的日本人身份，她逐渐厘清了东西方文化碰撞所传授给自己的成长经验。事实上，被否定和重获新生是一个相互作用、不断生发、持续深化的过程，再次投身于虚无的决定不仅意味着阿梅丽对日本人身份态度的转变，也表明了阿梅丽伦理选择的成功。于是，阿梅丽在合同到期之前选择放弃续约，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伦理身份与血缘身份的合一。在阿梅丽离开日本前与莫利胡布纪道别时，莫利胡布纪对她的排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智力障碍？”（124）为使莫利胡布纪满意，阿梅丽选择继续配合，她说道：“有，伊美本公司帮助我发现了这一点”（124）。在回到比利时后，阿梅丽尝试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令她颇感意外的是，莫利胡布纪仍然对她保持关注。在小说出版后不久，阿梅丽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的信，信是这样写的“阿梅丽：祝贺你。——莫利胡布纪”（138）。尽管信的内容十分简短，但阿梅丽难掩喜悦之情。日语的书写表明莫利胡布纪对阿梅丽的态度从完全的排斥转变为承认后者的能力与价值，这也暗示了阿梅丽尝试做日本人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失败的。

《诚惶诚恐》通过展示阿梅丽由尝试建构日本人身份到遭遇伦理困境，无奈进行伦理选择并建构比利时人身份的过程，表明在充满种族中心主义思想的日本公司，阿梅丽对自身尝试建构的日本人伦理身份缺乏认知。虽然她认为自身符合作为日本人的一切客观条件，但她生理上的西方人特征以及并不真正意义上了解等级制度、男女地位、面子观等日本文化，使得她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来自日本同事的身份认同。对于阿梅丽而言，她选择以日本人的身份重返日本的结局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式的。在这记忆中“神话般的地方”（16），她无奈选择与日本人身份告别，回到祖国比利时意味着她做出了伦理选择，并开始对比利时人的身份进行建构，这是伦理环境对阿梅丽的内在要求。最终阿梅丽在比利时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这意味着她所建构的比利时人伦理身份得到了认可。小说对阿梅丽的伦理选择、伦理困境以及伦理身份建构过程的描写紧紧围绕她对东西方文化差异认知的改变展开，给饱受多重伦理身份困扰的人们带来伦理启示，即只有客观分析自己是否真正了解即将面对的文化环境，并能够应对不同文化间差异所造成的冲击，才能在遭遇伦理困境时作出正确选择，拥有理想未来。

### Works Cited

- Amanieux, Laureline. *Le récit siamois: Identité et personnage dans l'œuvre d'Amélie Nothomb*.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阿梅丽·诺冬：《诚惶诚恐》，廖观友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年。

[Nothomb, Amélie. *Stupeurs et tremblements*, translated by Liao Guanyou. Shenzhen: Haitian Press, 2000.]

刘家思、刘璨：“论曹禺戏剧创作中的伦理问题”，《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1）：509-523。

[Liu Jiasi and Liu Can. “On Ethical Issues in Cao Yu’s Drama Produc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1): 509-523.]

Lou, Jean-Michel. *Le Japon d’Amélie Nothomb*. Paris: Harmattan, 201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Zumkir, Michel. *Amélie Nothomb de A à Z*. Paris: Le Grand Miroir, 2007.